

收稿日期:2025-05-09

空间剥夺与制度反制： 应对美关税讹诈的新发展格局之智

陈爱娟

(盐城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美国对华关税讹诈的本质,是以技术封锁、产业链脱钩与美元霸权为工具,延续资本通过“空间剥夺”实现积累的固有逻辑,其深层目标在于掌控全球规则空间、控制数据主权,瓦解发展中国家集体议价权。面对挑战,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为指导,提出以制度反制破解资本空间剥夺的新路径,率先布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动推动全球空间秩序化。这一实践以“空间正义”超越资本逻辑下的空间剥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生命力,为发展中国家突破霸权桎梏、实现空间解放提供中国智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格局;空间剥夺;关税讹诈;制度反制

中图分类号:F752.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5-0051-1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动漫共情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与引导策略研究”(26MLD002)。

作者简介:陈爱娟(1980—),女,江苏如东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5.006

《资本论》对资本的论述虽未直接使用“空间剥夺”一词,但在具体解剖资本主义运行逻辑时,却为理解空间与权力关系提供了分析路径。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为逐利寻求最大范围内的经济交往,必然导致地理空间发展的失衡。资本不受控的贪婪本性不仅体现在对绝对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的压榨,还诡异地隐藏在对全球地理空间的掠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将农民驱逐出世代耕作的土地,传统村落沦为资本运作的破碎养料。资本扩张时期,资本将海洋变为航道,将殖民地变成原料仓库和商品销售市场,在地理大发现等的推波助澜下,全球空间剥夺网络已然张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交通方式和信息交流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物理时空距离,但无形中却加深了阶级鸿沟。当下,资本对全世界的空间剥夺是技术封锁与规则霸权,尤其是在此基础上的关税“大棒”,以美国为代表的受本国资本利益集团把控的国家,在所谓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下,逆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以不计后果的关税讹诈行为,企图强势瓦解其他国家维护空间正义的行动。

一、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核心逻辑——在资本批判中维护空间正义

《资本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从空间视域出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揭示了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对空间的理解绝不能停留在流通领域的空间拓展上,而应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空间本身的变化。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种空间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空间,而是资本在确立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过程中所开创的具有经济属性的社会空间^[1]。在资本的空间剥夺下,空间已沦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一种政治和经济工具。空间剥夺的精密化与隐蔽性,正是资本逻辑演进到当代的具体表现形式,资本会不断突破疆界创造积累的新空间。

(一) 空间剥夺的概念解析

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中的“结构性权力”概念来看,空间剥夺体现为核心国家通过资本积累、制度设计和文化霸权,对边缘国家实施空间重构和资源攫取^[2]。这就意味着资本不断通过对原有空间秩序的肆意破坏来完成对其既有利益的保护,形成空间固化,这在本质上是剥夺性积累的时空表达。依赖理论学者阿明指出,强调空间的中心和外围分化的空间等级制是通过不断固化国际分工,强制性地将众多发展中国家拖入“结构性空间依赖”^[3]。这种空间剥夺机制在当代表现为部分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刻意将污染密集型产业配置在“全球南方”国家,形成“生态帝国主义”的空间地理格局。再从苏贾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角度来看,资本主义通过物质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三重运作,将由其定义的所谓“边缘地区”打造成为资本利益无限增殖的“空间容器”^[4]。以上理论表明,空间剥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持其积累逻辑的必然产物。资本不断突破地理界限实现自我增殖,进而有意识地制造出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实体与虚拟的多重空间对立。例如:截至2023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已纳入超600家中国实体,以所谓“国家安全”名义,切断中国企业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连接;美国依据《芯片与科学法案》,联合荷兰、日本构建“芯片四方联盟”,限制14纳米以下制程设备对华出口,试图将中国锁定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这一系列针对我国的空间剥夺操作,都警示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对资本空间剥夺本性的批判,又要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应对新型空间剥夺的实践策略。

(二) 空间剥夺的表现

空间剥夺最先表现在资本对劳动空间的剥夺,这种剥夺加剧了区域发展失衡,最终导致世界各国的发展空间被人为固化为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分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资本主义将按照自身需要重塑世界空间,“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5]。这种空间权力结构在当代演变为全球空间发展“剥夺”与“被剥夺”的等级体系^[6]。资本通过剥夺和占有有限空间,昭示其无限的逐利欲望,资本的横向与纵向增殖,本质是将一切自然空间与社会关系转化为可剥削的“资本容器”。横向解决“往哪里扩张”,纵向解决“如何榨取更高效”,横向扩张为纵向控制提供资源与市场,而纵向技术升级则进一步推动横向空间征服,这两者共同构成资本“滚雪球式”积累的双轮。

著名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指出,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通过金融资本控制世界经济命脉,而非洲资源型国家则沦为原材料供应地^[7]。这样的空间权力异化还体现在制度性排斥上,先发国家通过知识产权壁垒、关税等手段,将后发国家牢牢压制在产业链的最底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危机后,为应对实体利润率停滞,资本在解除管制

的政策配合下,大规模涌入既有的虚拟资本领域,形成了金融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由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将剩余价值分配重心从生产性投资转向金融投机。依据美联储 2019 年的调查,美国经济中非金融类企业金融资产约占总资产的 44%,在金融资产中,房地产约占 70%,股票资产约占 11%。在最低收入 50% 的家庭中,金融资产占总财富的比例大约 8.5%;在中间 40% 的家庭中,金融资产占总财富的比例大约 12%;在收入前 9% 的家庭中,金融资产占总财富的比例大约 22.7%;在收入前 1% 的家庭中,金融资产占总财富的比例大约 36.5%。发达国家的工业资本通过对全球空间的人为分割和控制转向金融资本,资本的不可控空间剥夺机制逐渐从显性的领土扩张转向隐性的规则钳制。这一演变不仅延续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逻辑,更在技术革命和规则制定中呈现出新的方式。

资本的空间剥夺表现在从实体领域延伸至虚拟领域,权力压制表现在金融资本主导的规则剥夺,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权力网络。当代资本的扩张通过国际金融体系、贸易协定和知识产权制度,构建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规则空间,这种规则剥夺的深层逻辑在于将全球经济空间的价值分配规则向资本倾斜。它的隐蔽性在于表面上遵循自由市场规则,掩盖将剩余价值攫取合法化的规则欺凌性。当金融资本的规则剥夺遭遇抵制和反抗时,数字信息化时代的资本体系又衍生出更隐秘的数字霸权,将空间控制从可看可感的实体规则隐匿为无实体感应的虚拟算法。这种数字霸权的空间剥夺性首先体现在主权层面:2018 年通过的 *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云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强制调取境外服务器数据,只要数据由美国企业(如微软、谷歌、亚马逊)控制,无论存储地是否在美国。云法案的战略意图就是美国通过技术霸权掌控全球数据管辖权,削弱他国数据主权,独占规则话语权。如此一来,身处算法权力底端的发展中国家只能面临“数据流出但算法受控”的困境。这种不对称的数据权力结构将国家地理疆域虚拟化为数据流量池,形成数字时代的“中心—边缘”秩序。例如,在特斯拉汽车将从中国道路采集的高精度地图数据直接回传美国总部时,空间主权的传统定义已经被技术霸权无情侵蚀。数字霸权重构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而全球价值链的等级固化则将这种空间剥夺推向结构化困境。

资本的空间剥夺还体现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分配不公。占有大量资本的国家通过其主导地位控制大多数生产标准的制定权,把持产品核心部件的供应和销售渠道。而发展中国家即便能够挤入高端制造环节,也长期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突破。以全球对高端芯片需求为例,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以其在光刻机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市场影响力,成为这一竞争中的重要角色。然而,美国出于对中国科技崛起的警惕,自 2018 年起对荷兰施压,限制 ASML 向中国出口高端光刻技术设备,试图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这种人为的技术封闭和技术依附性,使得全球价值分配链始终受制于中心国家的“许可空间”。总而言之,全球价值链固化的本质是空间剥夺的制度化。

这种空间剥夺的典型事例就是美国近年来发动的关税战,尤其是 2025 年 4 月对中国的一系列关税讹诈。这种“谜之操作”绝非单纯的贸易保护政策,而是资本空间剥夺逻辑在全球化时代的升级。美国试图将全球经济空间打造成等级化、排他性的权力体系,其本质是对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空间化”逻辑的延续。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高端技术产业领域内实行排他性空间垄断,这也正是资本剥夺空间的核心手段。美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制裁等措施)本质上是强行人为垒筑高精尖技术地理空间高坝,将技术升级可能锁定在以美国为主的先发国家主导的资本空间内。这种“知识圈地”与 16 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羊吃人”的圈地逻辑如出一辙。前者通过高筑专利壁垒来霸占创新成果,后者通过暴力圈占土地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言,“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

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8]。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操弄者们狡黠地运用技术封锁,将发展中国家禁锢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这种空间剥夺不仅体现在经济收益分配上,还体现在长期恶性的技术垄断逐步固化产业发展空间的等级结构,威胁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不仅如此,美国还进一步通过占有资本强权意味的法律工具,强制性搅乱贸易交往规则空间,使得这些所谓“规则”成为听从美国的“暗箭”,这样的一系列操作也为这种空间剥夺披上所谓“合法”的外衣。

美国关税讹诈的空间剥夺本质还表现在长臂管辖与美元霸权。美国将全球经济交往空间强制转化为独属于美元流动的管道,以强权和霸道限制任何试图脱离该系统的行为。在这样的货币空间专政下,全球经济交往的合理空间被金融霸权规则扼杀。美国的长臂管辖,也就是通过法律域外效力,将美国标准强加于国际体系,将美国国内法域外效力转化为空间规训工具。例如,SWIFT系统(美元结算霸权)、CLOUD法案(要求境外科技公司提供数据)等。当法国阿尔斯通、中国华为等企业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遭受处罚时,表面上是对具体企业的制裁,实质是肆无忌惮地对别国经济主权空间疯狂蚕食。

当技术封锁与规则和资本化遭遇集体抵抗时,美国则转而运用关税战的意识形态功能,瓦解发展中国家维护空间正义的联合行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遮蔽功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美国将关税战包装成“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普世价值”,实则是企图借此分化发展中国家维护全球经济交往公平的统一阵营,甚至堂而皇之地假借其军事地位和美元霸权恐吓、施压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美国凭借其供应链关键节点的优势地位,在“供应链安全”名义下,动用行政手段实施“脱钩断链”“去风险”“友岸外包”等手段,以达到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真实意图^[10]。此外,美国关税战的意识形态攻势还体现在对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污名化。美国公然将“中国制造2025”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威胁”,将“一带一路”倡议丑化为“债务陷阱”,其险恶用心就是借此剥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空间权利。美国通过关税保护本土农业,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工业品市场,这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强国在工业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在丧失优势时则转向贸易保护。

(三) 在资本批判中维护空间正义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资本的批判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伦理批判,马克思不是以空间本体论的方式追求空间正义,而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将空间置于具体历史发展之中予以追求。这一理论的核心逻辑采用资本批判的方式,揭示资本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构实现积累的本质,进而维护空间正义,追求空间解放。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不仅解释了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中的暴力剥夺,也为理解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矛盾提供了重要工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剥夺从一国扩展到全球,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和贸易垄断,将后发国家纳入资本积累体系。这种空间扩张的本质,是将全球地理差异转化为资本增殖的阶梯,逐步形成利于资本剥夺的“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固化结构。原始积累的空间暴力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基础,而这一过程始终与劳动剥削的空间化形态紧密交织。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今天,劳动剥削的空间固化和分层愈加明显。资本利益集团裹挟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霸权,依托先发优势,通过全球劳动力层级的划分和固化,将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研发设计,控制在资本集中的少数发达国家,而将加工组装等低利润空间环节,转移到“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空间配置和分割看似仅仅利用不同地区的劳动力价值差异,实则是别有用心地以不对等机会中的被动国际分工,掩盖其吸血和不顾一切剥削的赤裸本质。例如,一部智能手机的零部件

在十余个国家生产,但其利润的80%以上都有可能流向品牌商所在国。

二、新发展格局制度反制——展现“先手棋”能动智慧

(一) 对国内发展空间的整合

这种整合不仅是经济地理层面的统一,更是制度层面的创新。打破传统行政区域壁垒,优化各生产要素配置,强化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协同与数字治理。中国正以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先手棋”之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体系面向更加通畅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全局,为应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打下扎实的制度根基。

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前提在于破除各个区域的行政分割现状,不断打通区域交流渠道,解除对资源流动的原有制度性束缚,从而将以往零碎的发展空间协调统一,完成创新性的发展整体“大空间”的构建,从而实现经济交往高质量提升的目标。当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决不能搞绝对的均质化重复发展,而是要注重利用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的功能分工,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互补性制度安排,凸显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因此,也只有采取这种既统一又分层的制度,才能为后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基础支撑。统一大市场建设解决了要素流动的区域性物理阻隔,但要实现空间治理的全面升级,还需在区域层面构建更具韧性的协同机制。例如,从长三角区域到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正不断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关于地理相邻的区域却在发展政策上相互排斥的困境,探索空间整合更加科学合理的深层逻辑。

当物理空间与制度空间的整合逐步深化,新兴的数字技术为实现良好的空间治理开辟了新思路。AI时代数据和信息为王,数据要素的涌流和配置,正在重新定义传统地理空间的现实意义,并逐步衍生出具有巨大弹性的复合型数字化智能空间治理模式。数字空间治理的核心在于处理数据的流动性需求与现实生活对数据安全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依托大数据的覆盖面以及强大的算力产生了令人惊愕的发展力,但同时也面临权属模糊、交易成本高、跨境流动受限等瓶颈。面对这一困境,我国创造性地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既保障数据来源者权益,又释放数据流通价值。从更深层次看,数字空间治理需平衡效率与安全、开放与自主的关系。

(二) 对全球贸易秩序传统空间的突破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寻求突围之法,不断通过制度的更新和改革,探索突破传统国际分工体系的突围路径,进而实现全球贸易秩序的正常化。具体可以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来看,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使命已从政策优惠的“试验田”转向制度创新的“策源地”。这种制度创新突破了传统自贸区的思维定式,创新性地采用精准监管的治理方式。这样的制度创新正不断形成合力,助推区域价值链的重新配置,进而探索出一条区别于传统依赖人口红利的发展路径,即凭借不断健全的制度红利开创新的发展天地。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尝试为我国逐步突破传统国际经贸规则提供了借鉴,而“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框架则着手构建新型“南南”合作范式。

这种空间治理战略的转换,既延续了国内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又正视了全球发展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形成了制度创新与空间正义的双向互动。表现在国家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不断打破地理隔阂,缩短物理距离,形成生产要素的无障碍流通。不同国家之间优势产能互补合作共生,技术转移从单向输出转向互通互动,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金融支持机制。在这一系

列的举措作用下,通过国内大循环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协同发展,中国与部分国家形成了产业共生链条。故而,当全球物理空间的互联互通不再遭受人为阻碍时,数字空间的规则博弈必然成为新的战略高地。

截至2025年8月,中国已与26个国家签署数字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2026年9月,已与38个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数字合作网络覆盖五大洲。中国构建和布局“数字丝绸之路”,既是对冲西方数字霸权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技术空间布局的前瞻性部署,标志着国际竞争从有形空间向数字空间的转移和升级。中国不断创新和发展数字时代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实现数字基础设施的自有突破和技术应用场景的共享开发。例如,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的云计算中心,既提供算力服务,又协同制定数据安全标准,这种技术和制度相结合的模式创造了数字时代的非零和博弈模式。这种创新不仅避开了传统技术援助的依赖陷阱,更通过建立数字主权的对等关系,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制度接口。

(三) 对复杂经济发展空间的资源博弈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早已突破传统领域,不断向法律、资源、规则等综合复杂的空间延伸。制度反制需要依托各项创新性政策,这不是停留在某个单独空间领域的纵向拓展,而是依赖于多个复杂空间的战略性联动。以“国内法的域外适用”为例,它特指一国通过立法手段将国内法律的效力延伸至境外,影响域外个人和实体的行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交往活动频繁,少数国家将国内法域外适用作为新型法律战工具,其本质是通过主权立法权的空间延展重新定义国际规则边界。

在全球百年变局的棋枰之上,中国制度创新的智慧恰似围棋中的“先手”布局,在维护空间正义的无声战场演绎着守正创新的辩证法。当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仍在用线性思维伸出霸权触角时,中国智慧已经着手构建规则体系与产业生态的共生网络,既以现代化法治框架应对现实挑战,又以“和而不同”的文明特质保持战略定力,在制度博弈中形成独特的空间治理格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这种智慧不同于简单移植或对抗的二元逻辑,呈现出独特的系统论思维,更注重制度供给与战略需求的动态平衡。

三、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范式创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中国化创新不仅回应了本土发展需求,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实现了对经典范式的突破性发展,形成了特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种独特性创新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创造性融合了数字时代的技术特征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诉求,还结合了中国传统智慧哲思。

(一) 以制度的优越性实现空间主权复归

突破空间剥夺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智慧,其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空间治理范式的系统性创新。首先,从空间正义的角度重申发展伦理。传统空间剥夺理论将空间视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强调“中心—边缘”结构下资源分配的零和博弈。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则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度设计,将空间正义从单纯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提升为倡导价值重新分配的发展伦理,强调不同空间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共生权。其次,以制度弹性创新了空间治理范式。新发展格局尊重多重空间的有机融合,将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空间重组纳入同一分析体系,突破了传统发展理论将国际国内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形成新型空间治理形式。再次,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推进发展。中国智慧将空间发展权问题置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

野中,提出生命共同体的空间认知框架。这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理论中将空间工具化的认知局限,创造性地构建了新型空间发展观。总而言之,中国智慧的理论范式突破不仅挑战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剥夺机制,更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发展理论体系,为全球空间治理提供了新的认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

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先手棋”智慧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核心要义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11]空间生产主体转向人民共有,体现为生产资料公有和集体所有前提下的空间开发制度的创新。对于空间所产生的价值分配也可以从传统的单独依赖市场转向全面公平共享,建立空间规划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最终实现从技术理性向民众参与的转变,构建一个整合多方规划的公共协商空间治理模式。该创造性实践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空间异化现象的批判性立场,并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了空间主权的本真性复归。

(二) 以资本的规范流动实现空间科学治理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方案中,通过实施“制度反制”“技术赋权”和“规则塑造”策略,旨在实现创新性突破。该方案致力于将依赖性空间转变为自主性发展的核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套系统性的解决策略,以应对空间剥夺问题。

资本就其自身而言,既具有作为生产要素的客观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剥削工具的社会属性,资本主义是生产关系系统,资本是价值运动实体,前者决定后者的社会属性,后者构成前者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将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否定其生产力促进作用的资本妖魔危言,还是以“发展”为名放任资本无序扩张,掩盖其剥削本质的资本神圣诡辩,都是未能看清资本属性的错误言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同样可以发挥其自然属性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必须通过为资本流动设置相应的调控机制,有效抑制资本的无序增长和扩张,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治理模式。实现制度反制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在于构建“双循环”制度框架,形成具有弹性特征的反制体系。与欧盟依赖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单维度法律对抗不同,也与东盟通过区域价值链重组实现的被动规避有所区别,中国通过国内市场制度的升级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创新同步推进,将关税反制内化为推动发展模式升级的催化剂。这种制度创新突破了传统贸易救济工具的对抗性逻辑,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增强制度韧性,以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内生循环能力,在制度层面实现将“规则接受者”角色转化为“制度创造者”的身份,实现制度优势向空间治理效能的转化。

服务贸易的开放化是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智慧型经济的典型体现。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制度型开放策略,吸引全球高端资源,促进服务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竞争转变,推动了负面清单制度的改革。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试点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探索数据主权与开放之间的平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治理标准。依托国内庞大的服务市场,培育本土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形成以内需促进外部开放的新动能。在此过程中,国内相关配套制度亦实现了优化升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经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为了与国际规则创新保持同步,提升服务贸易治理的系统性效能,中国于 2021 年主动向新西兰提出申请,正式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申请加入 DEPA,与中国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相契合,有助于在新发展格局下加强与各成员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推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三) 以先进技术的赋权推动空间发展主导

中国方案着重于在技术赋权的背景下推动空间发展的生态主导,致力于构建一个自主且可控的创新生态系统。与欧盟侧重于技术标准联盟的防御性策略,以及东盟依赖于技术梯度转移的适应性策略不同,中国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中国将数字基础设施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整合,形成了一个由技术标准、产业生态和数据要素构成的三位一体赋权体系。通过这种技术赋权,中国在数字主权的构建中实现了全球价值链位势的重构,并在关税博弈中培育出非对称的技术制衡能力。

在当代,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空间的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中国化创新则显示出其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数字孪生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空间辩证法呈现出新的形态,虚拟空间的拓展为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数字孪生技术在城市建设中的直接应用,实现了城市治理效能的几何级数提升,同时,实体空间的根本地位也得到了制度性的强化。这种创新实践验证了马克思关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与“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本质区别的理论^[12]。中国方案为全球数字空间治理提供了新的范式,有效地解决了西方普遍存在的“数字殖民主义”困境。数字货币的兴起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预见货币的形式规定性必然随着交换过程的扩大而改变^[13]。数字货币正是这种形式演变的当代体现,通过技术赋能,使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突破了地理疆域的限制。数字货币结算体系的核心优势在于减少对中介货币的依赖,并且具备良好的灵活调整性,这一技术特性恰好符合许多国家在经济交往中的现实需求,逐步形成了货币主权共享的新型贸易交往方式。与欧元区的单一货币替代不同,数字货币结算池允许成员国保留本币发行权,通过算法动态调整货币篮子权重,既维护了各国宏观经济的自主性,又通过规模效应增强了集体议价能力。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范式创新的中国方案,通过对空间运行规则的重新塑造,展现了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动意识。与欧盟维护多边主义框架的改良主义路径,以及东盟依托区域协定的碎片化策略不同,中国通过RCEP、“一带一路”等机制创新,推动形成包容性制度型开放体系。这种规则实践超越了被迫适应接受规则的固有逻辑,突破了区域主义的地方性局限,掌握了发展主动权,同时牢牢守住了发展的安全权,将关税博弈提升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层面,开创了发展中国家主导规则演进的新范式。2012年,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角色由“被动参与者”转变为“规则设计者”。RCEP涵盖人口超过35亿,占全球47.4%,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32.2%,外贸总额占全球29.1%,是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最具潜力的自贸区谈判^[14]。该协定在原产地规则方面进行了创新,采纳了区域累积规则,促进了成员国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网络,从而缓解了美国主导的“脱钩”压力。此外,RCEP采取了更加包容的开放模式,充分考虑了东盟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性,通过渐进式的开放路径实现了不同制度间的相互兼容,与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高标准化“一刀切”模式形成鲜明对比。RCEP的最大亮点在于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创新探索,首次在RCEP中纳入电子商务条款,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提供了“东亚模板”,并抢占了规则制定的先机。RCEP的实践证明,中国通过区域合作框架,将国内市场制度与国际规则创新相结合,构建了一个更具弹性的多边治理体系,而非东盟式的被动规避策略。

此外,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传统治理模式中的空间等级化、碎片化困境提供了系统性方案。这种独具中国智慧的空间治理观,突破了主权边界思维,在技术协作、基建

互联与气候责任等领域构建起新型空间关系网络。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制度创新,本质上是通过科技发展权利边缘的延展来破除传统技术霸权下“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结构,建立联合创新中心、数字技术标准互认、知识产权共享等机制。

四、从空间反制到空间赋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叙事

在当前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趋势下,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展现出其时代价值。资本主义传统逻辑下的空间剥夺与霸权扩张正面临结构性矛盾,这一点在美国2025年关税讹诈的升级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单边关税壁垒和长臂管辖,试图将全球产业链强行纳入其霸权支配的“中心—边缘”体系,这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下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的系统性剥夺。这种以规则霸权为工具的空间挤压,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内生性矛盾,也证实了资本通过空间扩张转嫁危机的现实。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空间非正义的批判主要聚焦于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相比之下,中国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空间治理的终极目标,提出了一种全面且多维度的空间正义理念。该理念既承袭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传统,又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创新。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仅是对美国关税政策的有力反击,更象征着中国空间治理战略从区域协调发展向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转型。通过强化国内大循环,提升自主性;通过优化国际循环,重塑全球公平性。社会主义空间治理的核心并非单纯取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而是通过制度的制衡与赋权,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新生态。

参考文献

- [1] 孙乐强.《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J]. 现代哲学,2013(5):6-11.
- [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 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8.
- [3]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M].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4:212.
- [4] Soja. Thirdspace[M]. Oxford:Blackwell,1996:66.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 [6]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沈晓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7]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89-92.
- [8]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5.
- [9]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1.
- [10] 杨继军. 勘破美国将供应链“政治化”的霸凌本质[N]. 光明日报,2024-07-05(11).
- [11] 习近平.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 求是,2020(21):4-10.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8.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89.
- [14]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二十七轮谈判为北京部长会议做好准备[EB/OL]. (2019-08-01)[2026-09-08].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9/0801/c1004-31269727.html>.

Spatial Dispossession and Institutional Countermeasures: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Response to US Tariff Extortion

CHEN Aijuan

(School of Marxism,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 extortion against China lies in employing technological blockades, industrial chain decoupling, and dollar hegemony as instruments to perpetuate capital's inherent logic of accumulation via "spatial dispossession", with the deeper objective of dominating the global rule-making space, controlling data sovereignty, and undermining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w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face of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hina, guided by Marxist spatial theory, proposes a new path of institutional countermeasures to break capital's spatial dispossession. China has taken the lead in foster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advancing a new global spatial order. This practice transcends the spatial dispossession inherent in the logic of capital by pursuing "spatial justice" and advances the moderniz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guided by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vitality of Marxism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and provides Chinese wisdo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reak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hegemony and achieve spatial liberation.

Key words: Marxism;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patial dispossession; tariff extortion; institutional 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陈济平]